

導言

婦女報刊、女性主義與新聞媒體空間

中國自1898到1937年間經歷了從傳統帝制到現代國家的重大轉型過渡，無論是政治體制、經濟結構還是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在中國現代國族主義意識逐漸形成的這一時期，新聞報刊業也經歷了從初興、發展到繁榮的過程。新聞報刊不但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變遷、改良、動蕩和革新，也深刻影響了公共輿論的形成和民眾對國族問題和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意識。近代中國新聞業的發展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即知識階層女性不但作為筆者進入主流新聞媒體，她們還創辦了婦女報刊。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女性在人文薈萃、風氣開通的上海創辦了第一份完全由女性主筆和編輯的報刊《女學報》，以提倡婦女權利，討論女子教育、職業、婚姻和男女平等。很快，其他中國婦女報刊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問世：上海的《女報》、《天足會報》、《女子世界》、《中國女報》、《神州女報》等；北京的《北京女報》、《中國婦人小雜誌》、《中國婦女會報》等；以及留日中國女學生

在東京創辦的《天義報》、《中國新女界雜誌》等。這些女性刊物共同致力提倡女性的自由平等、經濟獨立和家庭革命。此後的幾十年間，婦女報刊在中國主要城市中的數量不斷增加。一批優秀的知識女性成為了婦女報刊的編輯、主筆和出版人，在公共領域中建構了多樣的女性主體位置 (subject position) 和女性主義話語 (feminist discourse)，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啟發並引導中國女性走出家門接受教育、參與社會生產，並從事國族運動和婦女解放。

在此期間，女報人、主筆和編輯帶著鮮明的女性主義意識來編撰報刊，站在女性立場發表她們對政治、社會和女子問題的看法，倡導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討論國族問題，點評時事和報道新聞。婦女報刊開闢了一個新的空間，讓女性可以討論家庭和個人生活之外的社會問題，並將目光投向中國以外的世界，對中國女性的思想啟蒙和性別意識的形成實屬功不可沒。女報人不僅是女性讀者的精神導師、傾訴對象，還是她們尋求援助的源頭和女性社會角色的榜樣。當不同的國族主義話語在新聞媒體中激烈探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可能路徑時，婦女報刊為我們保留了女性的公共書寫，反映了女報人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女性主義問題的看法和反應，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中國早期女性主義的寶貴資料。在1898到1937年間，中國各地曾經出現過數百種婦女報刊，這充分證明了知識階層女性在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活躍。通過編輯發行婦女報刊，她們不但創造了女性的公共話語空間，重新定義了女性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更重塑了她們的公共身分：女筆者和女編輯逐漸從傳統的文學意義上的「才女」，嬗變成有現代職業素養和社會性別意識的女報人。她們是活躍在城市公共空間、獨立且有影響力的職業女性。

19至20世紀之交的中國有如一一個剛剛拉開帷幕的歷史舞台——各種反映了不同政見與現代思想的人和事陸續登場：1898年維新派的憲政改良失敗；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猛烈抨擊中國傳統制度和文化；接受現代西方式教育的知識分子

積極地倡導國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現代城市是以上各種變化的發源地和實踐場所。對城市中接受過良好現代教育的階層而言，上述種種變化共同顛覆了儒家思想體系中男尊女卑、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規範。對於那些勇敢地走進城市公共空間的女性而言，追求現代教育和社會生產、參與政治和公共事物的大門正在向她們打開。在主要城市裏，上層、中層以至勞工婦女逐漸在學校、職場、生產領域和婦女運動中嶄露頭角，一些女性活動家活躍在政治、社會和婦女運動中。當城市女性的生活經歷顯著變化的同時，女報人通過編輯婦女報刊在公共領域中倡導男女平權和婦女解放。婦女報刊成為女報人與國族主義、父權制和政黨路線就現代化進程中的女性議題進行角力的公共場所。女報人根據女性的切身需要和面臨的現實問題、國家所行的政策法律，以及她們當時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不斷地重新定義女性的需求和權利、捍衛女性利益，並引導社會朝著對女性有利的方向發展。

中國早期的婦女報刊不僅表現了女性主義的多樣化和複雜性，更提出了重要的女性主義話題。之後無論是國民黨時期、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改革開放年代，這些話題始終歷久彌新。即使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仍然受到早期女性主義話語的影響，還在使用先前婦女報刊的讀者們所熟悉的詞彙和語言。本書聚焦於中國的女報人如何在主要城市（上海、東京、北京、天津）創辦婦女報刊、建構女性主義話語，並與父權制思想和國族主義話語就女性在現代社會應有的角色進行辯論。是什麼原因促使早期的知識階層文學女性進入到新聞媒體領域？為公眾閱讀消費（public consumption）而寫作對女性作者意味著什麼？女報人是怎樣編輯報刊，兼容不同的女性主義聲音，並與讀者們互動呢？她們如何與國家、政黨和男性主導的主流媒體進行角力，來定義女性的需求、社會角色和主體位置呢？她們怎樣介紹國內外的傑出女性和各種女性主義思想與實踐，評論與女性相關的社會事件，調解有爭議的女性議題？女報人的社會背景、公共身分和社論立場隨著時間推移有

怎樣的變化？如果新聞業能帶來並促進社會變革，女報人如何通過她們的寫作、編輯、出版和實踐，引導社會變化呢？婦女報刊為女報人和女性讀者又提供了怎樣的公共空間呢？

本書採用歷史學文本分析的方法，從社會性別 (gender) 的角度來研究在國族建設的重要時期 (1898–1937)，婦女報刊的內容及其社會意義。筆者視女報人為能產生社會變化的能動者 (agent)，來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女報人的公共書寫所關注的內容。身處各種劇變中的女報人是如何對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女性問題發表觀點和建議，來引導社會變化朝向她們期望的方向發展呢？婦女報刊又如何與男性主導的新聞媒體競爭女性主義話語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建構新的女性主體位置和性別規範，並將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納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本書不僅研究女報人如何從有政治意識的儒家士紳女性嬗變為現代的職業報人，還關注婦女報刊如何從代表女報人政治立場的政論性報刊，逐漸演變成為關注大多數女性需要的大眾刊物。在歷史流變中，「女性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概念被賦予不同的甚至是充滿爭議的含義，而女報人透過靈活運用國族主義的話語，表達各種女性主義訴求。

本書有三個重點。第一，本書致力於把國族歷史和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以外的女性主義話語融入到中國女性的歷史脈絡中。參與中國婦女運動的女性活動家來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 (liberal feminists)、基督教婦女、女性參政主義者 (suffragists)、女性改良家 (women reformers) 和來自不同黨派的女性。國共兩黨的女黨員只是女性活動家中的一部分。女性主義立場不同的女報人出於共同的女性利益和政治需求，可以跨越黨派、階級相互合作並為彼此的活動助力，為了女性主義目標而結成聯盟。第二，本書關注婦女報刊討論的女性主義議題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的連續性和變化。第三，本書探討早期中國女性主義話語對 20 世紀以降所有中國婦女的意義。作者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常常跨越時空與早期女報人所持的女性主義觀點產生共鳴，並深受她們建構的女性主義話語所啟迪和激勵。

嬗變中的女報人

自晚清以來，政論性報刊成為男性精英倡導強國之策、設想新型政治體制的有力武器。當男性有志之士在政治觀點鮮明的報刊中構想新的國族主義觀念、並傳播與之相關的知識時，女性進入新聞媒體的現象，使得學者們不得不修改他們研究中國社會關係和文化生產機制所用的一些基本範疇。女報人通過編輯婦女報刊，不但公開宣告了她們在公共話語中的存在，而且攻擊了父權思想，倡導民主觀念和新型男女關係，進而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塑造了她們的公共職業身分。

女報人與傳統的文學女性（「才女」）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女報人是擁有公共身分的現代職業女性，而「才女」是運用自己的文學才華為家族利益服務，大多不會有意識地為公共寫作。「才女」是在家庭生活中為自己營造一個文學創作的空間，不會挑戰儒家性別體系賦予她們的家庭角色和女性地位。「才女」們的寫作和出版通常是為了保留女性的聲音，而不是為了改變她們的生活。現代女報人的寫作關注的是宏大的國族問題和女性的切身利益。她們為滿足讀者的消費需求而寫作，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影響讀者並產生社會變化。女報人經常挑戰現有的性別規範和女性的生活現狀：她們提倡女性權利，傳播女性主義觀念，動員女性關心國族大事、參與公共生活、關注女性利益。

在1898至1937年間，為提倡女性主義權益而編寫婦女報刊的女報人背景各異。隨著中國政治環境、社會生活和文化氛圍的改變，她們的群體輪廓在不同時期呈現出多種的面貌。最初的女報人出現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前後，她們大多是倡導君主立憲的改良派官紳的女眷，都接受過良好的傳統儒家女學經典教育。她們被維新派男性提倡的「廢纏足、興女學」、「良妻賢母」、「保國、保種、保教」、「女性從事生產」等與女性生活相關的進步觀念所吸引，熱心地支持戊戌變法。她們勇敢地進入新聞媒體領域，暢談教育領域和家庭生活中應該實現男女平等，並且倡議女性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這些精英階層的女報人不但擅長用文言文寫政論，而且賦予傳統的女性文體新的功能。

她們用閨閣體詩詞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識，以列女傳的形式介紹西方的政治和社會女傑。¹

從1903到1913年間，在日本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女性成為主要的女報人群體。戊戌政變後，許多支持變法的維新派進步人士流亡日本。留日的女報人或是流亡政客的眷屬，或是赴日留學的女學生。這些女性多數來自官紳家庭，並受過較好的儒家女子教育。她們在東京和上海編輯了多種中文婦女報刊，討論中國女性的教育、職業、婚姻問題，提倡中國女性做有國族思想的「女國民」，並傳播反清的共和理想以及女界革命。她們精通文言文寫作，但也嘗試用白話、地方方言（如蘇白），以及南方的彈詞形式來寫作，以便文化程度較低的女讀者更好地理解她們刊物的內容。在20世紀初，東京和上海的中國女報人主要關注的是反清的共和革命；北京和天津的女報人很多是朝廷官員的眷屬，只能從保皇立場提倡社會改良。北方女報人關注如何強國、開民智，倡議女子愛國、接受教育、經濟獨立和男女平權。她們也批評政治的腐敗，暴露社會弊端和人民的麻木。² 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許多參加辛亥革命的女革命家轉變成了女報人，積極提倡中華民國實現女性參政。這些參政運動者分別屬於多個女性主義觀點和政治目標各不相同的參政團體，她們通常是各團體的發言人。因此民國初年的婦女報刊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並不代表公共輿論。不同的女性主義立場和參政目標阻礙了民國初年的女報人結盟。

從1915年起，接受過現代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試圖用西方的科學民主和各種現代思潮來改造中國社會。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割據的愛國熱忱。1919年5月4日，為抗議巴黎凡爾賽和會將一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租界轉讓日本，北京的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在五四運動前後的1915至1923年間，新式學校的女學生踴躍地編輯婦女報刊。受西方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影響，女學生在她們的報刊中探討女性在教育、職業、戀愛和婚姻中的平等和權利，關心女子參政權和繼承權。在19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

女黨員和基督教女性都在各自的刊物中宣傳她們的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1924–1927)中，一部分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轉變成為黨派人士。當時兩個聯盟政黨將國族主義定義為反對軍閥、統一全國和恢復主權，將婦女運動定義為婦女參加國民革命。這個時期的婦女報刊在女性主義該如何定義、應優先討論什麼議題上，展現了各種女性主義者之間(國共兩黨的女黨員、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基督教女性、女性革新派等)的話語競爭。

在南京政府時期(1927–1937)，隨著共產黨在城市中被鎮壓而轉入地下活動，這一時期的女報人多是來自中上階層的、有不同背景的知識女性，如國民黨的女黨員、女基督徒、職業女性、女性革新派、自由主義女性、女教師和女學生。由於當時不少大學開設了新聞系，新聞專業的學術報刊和理論書籍促使新聞工作逐漸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接受了良好職業訓練的女報人按照新聞業的職業標準(「客觀性」、「為民發聲」等)來編輯婦女報刊。她們普遍關注女性的社會問題，親自採訪傑出事業女性，調查有爭議的女性事件，調解不同的女性主義觀點。來自不同背景的女報人成為公共事件的仲裁人和女性權益的捍衛者。她們在國族主義和女性主義運動中形成了女報人的圈子，敢於批評國家政策、社會偏見、大男子主義和當時法律規定對女性的各種不公平。

女報人與女性主義

婦女史與女性主義的話語研究不能簡單地依靠男性或政黨提供的資料，因為這些材料既不能反映女性的自覺意識，也不會給予女性主義話語優先權。另外，男性或政黨為女性制定的社會位置(prescribed position)經常不符合客觀現實和女性真正的需要。在政黨動員女性參加政治運動的歷史中，女性從來都不是主角。在男性對婦女問題的討論中，女性通常是被動的，不具有能夠主動產生變化的能力。清末的男性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五四時期的男性知識分子，都曾經在印刷媒

體中廣泛談論女性問題，但是他們的寫作主要是為不同時期的國族主義話語服務。清末維新派男子是為了「保國、保種、保教」而談論「廢纏足、興女學」，並把明治日本官方提倡的「良妻賢母」的女性觀念引入中國。辛亥革命前，男革命家提倡女性參與共和革命和從事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五四時期的男性知識分子，為了建立以西方啟蒙思想為指導的現代中國並實現他們的人文主義理想，提倡中國女性做有平等公民權的「新女性」。192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在國民革命中動員女黨員和廣大婦女通過參加國民革命來實現婦女解放。1930年代中期，在日本侵華壓力下日趨保守的南京政府提倡恢復傳統道德，再次將中國女性建構成守護傳統婦德、正當家庭關係和社會秩序的賢妻良母。

在哪裏能找到真正的女性主義聲音呢？白露 (Tani Barlow) 認為所有書面資料都不足以直接反應中國女性的生活。³ 那麼歷史上女性在報刊中公開發表的文章，至少可以間接地反映那個時代女性的生活和她們的關注議題。20世紀上半葉的婦女報刊保存了女報人對女性主義問題的觀點和建議，可以做為原始資料讓學者們研究女報人是怎樣建構女性主義話語、提倡新的女性主體位置，並把女性主義理念付諸實踐。女報人的公共書寫表明，她們是通過適應國族主義話語，並與政黨和國家的性別政策角力，來推動女性主義的進程。現存的數百種婦女報刊，向當今的讀者傳遞著20世紀早期的女報人怎樣看待女性與國族的關係、如何對中國社會的變遷作出反應，以及怎樣理解女性作為現代國家的公民應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事權利。婦女報刊的內容也顯示出，女報人關注的女性問題與男性倡導的女性主義話語和女性主體位置時常處於緊張關係，男性建構的女性主義話語不一定適合女性的現實需要。

在西方國家，女性主義是由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倡導的政治話語，旨在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和法律保護。西方女性主義話語通常關注男女的性別差異，提倡女性平等，爭取女性權益。在進入20世紀時，

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和中國女性面臨的現實困境，使得「女性權利」(women's rights)一詞在中國的含義相對複雜，大致有兩種意思：一種是人文主義理解的女性的自然權利和社會經濟機會；另一種是國族主義理解的女性在政治上參與建設現代中國的權利。在西方的女性主義運動中，女性爭取政治權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而在中國卻一開始就是題中之意。對「女性權利」的兩種理解決定了中國的女性主義從一開始就與國族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

西方史學家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關注中國女性的歷史，因為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席捲西方，促使史學家開始研究西方以外地區的女性的生活經歷和男女不平等。受到當時佔主導性的國族史研究的影響，最早的女性主義史學家把中國女性的歷史放在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下研究，探索中國女性與政治運動、國族主義及社會主義的關係。這些學者發現中國的女性主義服務於國族主義或社會主義，否認中國有自主的女性主義運動。洛克珊·維特克(Roxane Heater Witke)率先研究清末的女性革命家以及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對女性態度的轉變。⁴夏洛特·L·比恩(Charlotte L. Beahan)研究了民國初年的女革命家和女性參政活動家，認為中國女性主義運動與國族利益緊密相關，被國族利益所定義而處於隸屬地位。⁵阿里森·德魯克(Alison Drucker)注意到中國維新派男士和基督教傳教士都將中國女性表述得既愚昧又受壓迫。維新派男士認為他們倡導的立憲改良可以拯救中國女性，而傳教士認為基督教能改變中國女性的生活。⁶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學者戴莉婭·戴文(Delia Davin)和伊麗莎白·克羅爾(Elisabeth Croll)研究了中國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發現在共產黨成立後的不同時期，婦女的女性主義利益(性別平等、婦女解放)與共產黨的政治需要(階級鬥爭、大生產、社會主義革命)都發生過矛盾，女性利益通常須服從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需要。⁷

在1980年代，一些具有批判性的女性主義歷史學者研究了中國婦女如何在重重權力束縛下生活。菲yllis·安多斯(Phyllis Andors)、朱